

# 被迫当虎妈/爸？新加坡中产阶级中国移民父母的教育话语中的矛盾性

## 摘要

本研究通过对 31 名来自中国的、定居新加坡的中产阶级移民父母的深度访谈，探究其对于子女教育以及未来发展的话语建构。研究发现，这些父母会有意识地与刻板印象中严格控制子女、并对物质和地位追求抱有高期望的中国式"虎爸/虎妈"形象保持距离。相反，他们声称对成功有着更为广泛的定义，将子女的幸福感和自主性置于优先地位。这些父母最初将新加坡理想化为一个低压力社会，认为能够在此实践理想中的教育方式。然而，研究发现，这些父母宣称的教育理念与实际行为之间存在明显矛盾。尽管怀有良好初衷，部分家长仍坦言无法摆脱管控倾向，并对孩子维持着较高的学业要求。本文认为，这种言行不一的根源在于：儒家思想对中国家庭观念的持续影响、中产阶级中国移民父母对阶级流动的深层焦虑，以及新加坡社会崇尚成就的整体氛围——这些因素共同促使这些父母们不自觉地沿用了他们试图摈弃的教育式。

**关键词：**父母教养/育儿；移民；教育；"虎妈"

## 引言

2021 年至 2023 年间，在一项关于新加坡移民父母的研究项目中，我们对 31 位中国新移民<sup>1</sup>父母进行了访谈，探讨其对子女教育的影响。其中，来自上海的母亲 Audrey（化名）将家庭迁居新加坡的行为描述为对中国“成绩至上”教育环境的“逃离”。Audrey 明确拒绝接受那种对学业与职业成功的单一追求——这种价值观既体现在她上海同龄人的育儿实践中，也深深植根于她自身的成长经历。她认为对于高分、名校或高薪工作的追求并非教育的本质，更不应成为定义人生成功的唯一标准。通过移民为孩子提供更宽松的成长环境，Audrey 希望：

“……。另外的话，我希望我孩子能够在相对来说比较宽松的环境成长，不要在那么严苛的环境成长。[……]总的来说，我觉得在那个教育过程中被塑成一个螺丝钉，成为了一个工具人。当时我活到 30 多岁了我都不知道我活着是为了干嘛。生活的意义是什么，工作的意义是什么，我都没有找到。”

像 Audrey 这种迫切想要逃离中国式教育文化的例子并非个案。Beck 和 Nyíri（2022）对布达佩斯中国移民父母的最新研究表明，中国新一代中产阶级父母中，许多人移民的动机正是为了践行“儿童幸福优先于物质成就”的育儿理念。这种意识形态与既有文献形成鲜明对比——后者通常将中国父母刻画为学术卓越、事业成功与社会阶级跃迁的执着追求者（Fong 2007; Lee and Zhou 2014; Li 2004）。中国父母还常被标签化为奉行儒家传统的“虎妈虎爸”，通过高压管控培养“精英后代”，期待子女成龙成凤（Chua 2011; Wu and Singh 2004; Ho 2020）。

然而现有研究存在明显局限：其焦点主要集中于中国大陆或以英语为官方语言的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的中国父母群体（Lee and Zhou 2015; Watkins et al. 2017），而对于新加坡等非

---

<sup>1</sup> 在新加坡语境中，中国新移民（xinyimin）指的是在 1990 年新加坡与中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后移居新加坡的中国移民。

西方国家的中国新移民群体，其育儿理念、教育期望及具体实践的研究则相对匮乏（Zhou and Wang 2019 的研究是个例外）。这一研究空白与中国移民在新加坡的规模形成反差：2020 年的数据显示，中国大陆移民约占新加坡外来人口的 20%，仅次于马来西亚裔群体（Pan and Theseira 2023）。基于此，本研究通过对 31 位在新加坡抚养在读学龄子女的中国移民家长进行实证研究，旨在拓展关于中国家长教育的地域研究范围。基于研究对象的育儿经验，本文重点探讨以下议题：第一，这些家长在跨国环境中形成的教育理念及对子女未来的发展规划；第二，其教育理念和对成功的理解如何转化为具体的育儿实践。

研究发现，中国新移民父母最初将新加坡理想化为一个能够实践其教育理念的相对宽松的环境——在这个想象中，他们可以重新定义成功标准，更加重视子女幸福并尊重其自主权。他们刻意与“虎式育儿”的刻板印象保持距离，批评后者对子女的高强度管控和对学业成绩的病态执着。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父母宣称的理念与实际行动间存在着矛盾：他们往往不自觉地复现所批判的教育行为，如过度关注学业表现等。我们的研究揭示，这种矛盾既源于儒家思想对家庭教育的持久影响，也折射出中产阶级对阶级再生产的深层焦虑。更关键的是，新加坡事实上同样是一个优绩主义社会，迫使这些父母不得不重新采用以学术/职业成就为核心的狭隘成功观，甚至重拾“虎式教育”手段。即便主观上抗拒这些价值取向和教育方式，他们仍担忧任何妥协都可能危及子女在新加坡的发展前景。

下文中，我们会首先通过文献综述梳理现有研究关于中国父母（特别是移民群体）的意识形态、教育期望及实践模式的主要发现。然后简要介绍新加坡新中国移民社群的背景环境、本研究的研究方法与数据基础。最后呈现具体的实证研究发现以及结论。

## 文献综述：中国式育儿与移民

育儿一直是广泛研究的主题，因为养育方式对儿童未来发展至关重要。Baumrind (1971) 提出的育儿风格类型学——权威型、专断型、放任型和忽视型——为该领域做出了开创性贡献，

对过去数十年的心理学、社会学和教育学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20世纪末的大量研究考察了不同育儿方式如何影响孩子的学业成就（Weiss and Schwarz 1996）、行为（Aunola and Nurmi 2005）和健康（Shucksmith et al., 1995）。进入21世纪之交，研究者对育儿背后的文化逻辑产生日益浓厚的学术兴趣，开始系统探讨不同文化场域中的意识形态体系、规范框架和实践模式对父母育儿方式的塑造（Lim and Lim 2004; Bornstein et al. 2011）。

华人父母的育儿意识形态、期望和实践受到学术界重视，部分原因是华人移民子女在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显著学业成就。这些孩子的学业表现通常优于东道国同为中产阶级的同龄人以及其他移民群体的子女（Li 2004）。这些研究普遍将中国父母描述为专断型，表现为对其子女实施严格管控并对其持有超高的期望（Fong 2007）。Lee 和 Zhou（2014）提出的“成功框架”概念阐明了中国移民父母强加给子女的学业和生活成功的具体标准。基于对洛杉矶亚裔移民的观察，他们发现无论社会经济地位如何，中国移民父母都构建了以学业卓越、进入名牌大学和高地位职业为核心的狭隘成功定义。

许多研究在分析中国育儿方式时都提到传统儒家思想。儒家文化中，家庭被视为集体单位，个人的成功或失败反映在整个家庭，特别是父母身上（Lam 1997）。因此，父母有责任引导子女走向成功，子女则必须对其服从（Huang and Gove 2015）。在儒家思想中，教育备受重视，它不仅被视为是个人社会地位的象征性标识，更是实现阶级向上流动的最正统合理的途径（Li and Hayhoe 2012）。总体而言，这种儒家文化框架使得专断型育儿方式以及对子女教育成功的高期望被合理化。

早期研究强调儒家思想对“中国育儿文化中的教育导向、方法和目标”的持续影响，指出中国移民父母即使移居海外仍往往保持着传统的育儿理念及实践模式（Guo 2006, 第7页）。Amy Chua（2011）所书写的《虎妈战歌》是一个典型案例，这位二代美籍华裔母亲信奉儒家价值观，自豪地自称“虎妈”，通过严格管教和高度控制来促使子女取得学业与职业成就。

然而，最近关于中国育儿的实证研究表明，当代中国和中国新移民父母的对于育儿观念的话语构建正在转变。Way 等人（2013）对南京 24 位初中生母亲的研究发现，她们有意识地拒绝基于儒家思想的育儿观念。与以往专断型中国父母的传统形象不同，她们表现出对尊重子女自主权和优先考虑其幸福感的强烈意愿。同样，Beck 和 Nyíri（2022）研究发现，布达佩斯的中国新移民父母也表现出类似观念转变。这些父母移居布达佩斯是因为对中国“固定的成就模式和社会流动轨迹”感到不满（同上，第 920 页），转而追求孩子的幸福和自由。Beck 和 Nyíri 将这种育儿理念的形成归因于当代中国新兴中产阶级日益增强的价值取向——对自我主导、个体性发展及生活意义重构的持续追求。

尽管如此，Beck 和 Nyíri 也指出这些中国移民父母的观念与实际行为之间存在不一致。他们认为，对比和阶级再生产带来的本体性不安，促使一些父母重新采取“虎式育儿”手段——即便他们声称已经摒弃这种方式。Xu（2022）在上海一所私立幼儿园的研究同样发现了类似的“矛盾现象”——尽管中国中产阶级父母有意与“虎式教育”的刻板形象保持距离，但“过去十年间，他们却为孩子安排了越来越繁重的课业和辅导班”（第 59 页）。

鉴于这些关于父母在育儿方面所说与实际所做之间存在差异的新发现，我们致力于解析此类不一致性的形成机制以及其动因（若确实存在）。现有研究主要聚焦于中国大陆父母及移民西方国家的中国父母群体，而本研究选择了非西方国家新加坡（东南亚城邦国家）作为研究场域，为现有文献体系提供了独特的跨文化比较视角。

### 背景：新加坡的中国“新”移民家庭

近年从中国大陆移居新加坡的移民——特别是在 1990 年新加坡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后移民的人群——在新加坡被称为中国“新移民”，以区别于新加坡历史上已有的华人群体。这个岛国的

人口构成长期以来主要是华族居多，同时还有其他较小的族群，这是该地区早期移民历史遗留下来的结果。截至 2024 年中，新加坡总人口 604 万，其中近 70% 是"居民"，包括 360 多万公民和 54 万永久居民（Prime Minister's Office 2024）。新加坡居民人口按官方划分包括四个主要"种族"群体：华人 76%；马来人 15%；印度人 7.5%；其他 1.5%。非居民人口的种族构成虽未公开，但与居民人口相似。自 1990 年代以来，新加坡中国移民数量快速增长，这得益于新加坡相对开放的移民政策，旨在解决出生率下降和扩大高技能劳动力的问题（Yap 2003）。同时移民系统两极分化，只有高技能专业人士和年轻学生有机会永久定居（Yeoh 2006）。因此，新加坡的中国新移民通常教育程度较高，属于中产或中上社会经济阶级（Liu 2014）。他们大多较年轻，很多在新加坡组建家庭或带着年幼的孩子移民新加坡（Wang and Zhou, 2021）。

关于新加坡中国新移民家庭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特定亚群体——即为子女教育而移民新加坡，通常被称为“陪读妈妈”的教育移民母亲群体（Huang and Yeoh 2005, 2011, Yeoh and Huang 2010）。但这方面研究更多关注母亲（有时是孩子）的移民困境，而对于移民父母在子女教育及未来发展方面的教育理念与期望了解有限，尤其缺乏超越传统成功指标（如名校录取）的深入探讨。据我们所知，目前对新加坡中国新移民父母如何看待教育对子女的意义和价值知之甚少。本文旨在填补这一空白，探讨这些父母的教育和育儿观念，并研究他们的实际期望和行为是否与其宣称的观念一致。

## 研究方法

本研究数据源自一项考察移民父母对其 1.5 代/第二代子女在新加坡主流教育体系中的学业发展及社会融入的影响的项目。这项综合性研究（2021 年至今）已对 64 位来自四个主要来源国的移民父母展开深度半结构化访谈（数据截止至论文撰写时），包括：中国大陆、印度、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此外，研究还设有"其他"开放类别，以涵盖混合国籍背景和/或不属于上述四国的父母。选择国籍而非种族/民族作为参与者招募和分组的主要标准，是因为在当代背景

下，国家背景被认为与国家文化和教育体系更具直接相关性。极少数来自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的参与者在种族上是华人，但我们认为没有理由基于种族对这些参与者进行单独分类的理由。

本文基于对中国大陆移民父母的访谈数据（样本量  $n=31$ ）。研究对象通过研究团队的社会网络、滚雪球采样法及公开招募渠道获得。样本群体以 30-40 岁为主，均于成年阶段移民新加坡。多数研究对象育有多名子女，其子女可分为两类：新加坡本土出生者（界定为“第二代”）及 12 岁前迁居新加坡者（界定为“1.5 代”）。本研究的核心采样标准为：受访时其子女正就读于新加坡主流公立中小学体系。

从教育程度、收入和/或职业来看，中国参与者普遍属于中产阶级或中上阶层。大多数人拥有学士及以上学位，月家庭收入超过 11,000 新加坡元<sup>2</sup>，现任或曾任专业技术人员、经理或行政人员。参与者的社会经济状况反映了新加坡两极化的移民政策（Yeoh 2006）。虽然我们试图招募性别平衡的样本，但中国子样本中几乎全是母亲，仅有一位父亲参与者。然而，正如现有文献指出的，亚洲地区的育儿责任仍存在性别差异，通常由母亲主导育儿策略（Yeung 2013）。因此，尽管这种性别不平衡并不理想，但我们认为它不会影响研究父母意识形态和期望方面的数据有效性。

本研究中的访谈采用一对一形式进行，多数分两次完成，并使用普通话作为访谈语言。每次访谈持续 1-1.5 小时。访谈录音被转录后并被翻译成英文进行分析。所有参与者均使用化名以确保匿名性。遵循 Strauss 和 Corbin (1990) 的扎根理论编码，转录文本首先由第二作者进行编码。在开放式编码阶段，研究人员多次阅读转录文本并进行逐行分析以识别初始概念。随着编码的推进，概念和模式规律逐渐显现。例如，一个反复出现的主题是父母在协调育儿实践与培养幸福子女的理想时所面临的难以两全的困境，他们并不认可以物质成就来定义其子女成功

---

<sup>2</sup> 2023 年，就业居民的年度家庭收入中位数为 10,869 新元（新加坡统计局 2023）。

与否。这一初始编码过程随后进行理论编码和选择性编码，以建立新兴概念间的关系并进一步提炼主题。完成初步编码后，本研究接着进行了理论编码和选择性编码，以此来建立浮现主题间的关联，从而进一步细化主题。第一和第三作者更广泛地参与了初始数据收集和处理工作（如访谈、转录和清理），他们核查了第二作者的编码结果，提供了额外的“研究者三角验证”（Denzin 1970）。鉴于我们的采样策略和研究的质性特征，研究结论的普适性存在局限。尽管如此，31位参与者提供的信息体现出较为一致的规律。下文我们将呈现关于新加坡中国移民父母育儿意识形态和期望的研究发现。

### 对新加坡“更优质”教育的追求

与既往研究一致（Huang and Yeoh 2005, 2011; Waters 2015），我们发现希望子女接受“更优质”教育仍是中国父母移民并将子女送往新加坡就学的关键动因。新加坡教育体系因其双语教育政策具有吸引力，该政策让学生在英语教学环境中学习的同时保持使用母语的能力（Kim 2010）。父母相信，在新加坡获得的双语能力将使子女在成为适应性极强的全球性精英上具备竞争优势，能够“自由跨越语言和国家界限，获得更大的成功”（Bae and Park 2016, p.92）。Lucy，两位孩子的母亲，清晰地表达了这一观点：

“我们希望孩子沉浸在内的双语环境中，他可以轻松、地道地学习英语，这样就能融入讲英语的社会[...], 未来他们能有更多选择。虽然中国很大，但它只是一个国家，对吧？思维方式比较单一。我们希望孩子有机会开阔世界观，学习和认识世界。”

然而，父母决定让子女在新加坡求学的动机并不仅源于该城邦国家提供的优质教育。通常，这些决定更多地受到父母认为新加坡教育体系比中国压力更小的认知所影响。受访母亲 Molly 申请调往公司新加坡办事处以便带孩子来新学习，她将中国的教育比作“千军万马过独木桥”。中国的教育环境竞争极其激烈，这在一定程度上源于其高风险全国高等教育入学考试（高考）——学生的大学录取和未来职业前景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此（Kirkpatrick and Zang 2011）。这种

应试教育给家庭带来了巨大压力。据 Sofie 所述，如今为高考所做的准备工作最早可以从幼儿园阶段就开始，以确保孩子在进入高中时能具备全面的竞争力。正如 Lucy 感叹的那样，为在高考取得成功的压力如此之大，以至于让人感到"如果高考失败，你就会觉得整个人生都崩塌了，一切都完了"。

相比之下，新加坡的教育体系被认为更为宽松，对失败也更为包容。该体系提供了多种未来发展路径，使学生能够获得第二次乃至第三次接受高等教育和就业的机会（参见 Kwek et al., 2019）。父母们发现这种教育环境更具吸引力。正如 Lucy 所指出的，"在新加坡有更多选择，道路更宽广，不像中国只有高考一条路[...]"，孩子的压力不会那么大"。因此，新加坡的教育体系成为父母保护子女免受中国激烈学业竞争压力的"逃生通道"（Waters, 2015, p. 284）。

### 不再追求望子/女成龙

这些父母希望孩子逃离到海外相对无压力的教育环境中，反映了他们关于子女教育的更为广泛的育儿理念和期望。"育儿理念"这一概念，我们指的是关于教育意义和价值的信念体系，而"父母期望"则体现了这些理念在具体情境中的实践表达（Kiyama, 2010）。如之前提到的文献所述，当前关于中国移民育儿实践的研究仍存在将中国移民家长简单归类为专断型父母的倾向，且过度聚焦于将优质教育和人生成功狭隘界定为学业成就与职业声望的倾向（Lee and Zhou 2014）。

然而，当我们询问参与者如何定义子女的成功时，几乎没有父母强调学业或职业成就。相反，他们普遍强调孩子的幸福感，正如两个孩子的母亲 Sarah 所言：

"我觉得是他，不是成绩的也不是学历，也不是他有多少钱。就是说他能够好好的过好他的一生，这个是最成功的。 [...] 就是说他能够有享受幸福的能力，能够知道什么样的

生活适合他，能够有能力选择自己喜欢适合自己的那种生活方式来过好他的一生就可以了。[...]"

同样，Irene 认为，如果孩子"成为一个能让自己和周围人健康快乐的人"，就说明他接受到了良好而成功的教育。这里，幸福被视为成功和良好教育的核心。这一发现与 Beck 和 Nyíri (2022) 对布达佩斯中产阶级中国移民的观察一致，这些移民的育儿理念主要聚焦于培养子女的幸福和福祉。

此外，尽管大多数受访者毕业于知名大学并从事社会地位较高的职业，他们却表示并不期望自己的孩子走上同样的道路。相反，他们似乎更相信子女有权自主规划未来，认为成功应该建立在子女自我实现和追求自身兴趣的基础上。例如，Irene 就表达了她对儿子未来可能从事的职业类型持开放态度：

"我觉得就只要他能把他自己的潜能发挥到极致，然后内外兼修同时对社会能够有个正向影响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就可以了，那他将来说是扫大街也好或者说去餐馆刷盘子也好，做个科学家也好对吗，你上到去到外太空也好，只要他是一个他喜欢，第二他真的是把自己的、喜欢的东西能够发挥到极致，然后有正能量。"

Irene 强调对于职业的热爱而非声望，并淡化了职业阶层之间的等级差异。她希望儿子可以找到一份他喜爱的职业，无需顾忌这份职业的社会地位高于否。这一观点挑战了关于亚裔移民父母的普遍认知——通常认为他们会强迫子女进入高地位职业以确保维持或提升家庭阶级地位 (Poon 2014)。我们研究中许多父母认同 Irene 的观点，声称不太在意孩子是否成为高成就者，反而非常崇尚“平凡”，为其赋予很高的价值，认为人生成就也可在平凡生活中寻得。

Michelle 在设想女儿未来时表达了这一观点：

"普通老百姓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嗯，阶级，嗯，不用大富大贵。不用豪车洋房，只要她老公对她好，然后幸福美满的平稳的过一生就行。"

这种"普通人"话语标志着与中国传统"望子成龙"观念的显著背离——在传统观念中，无论阶级背景如何，父母都期望子女在社会中脱颖而出，出人头地（Wu and Singh 2004）。

此外，多数父母希望与"虎式育儿"保持距离。这种育儿方式以严格控制和高压期望为特征，旨在培养出高成就的"龙子/女"（Chua 2011）。作为两个孩子的母亲，Julia 对此的批评尤为尖锐。她指出，尽管虎式育儿或许能培养出高成就的子女，但其代价过于沉重。这一认知源于她朋友 18 岁儿子自杀的悲剧事件。这位朋友是典型的中国"虎妈"，对儿子抱有极高的期望：

"当时写在了这个报纸上面。他考了很好的成绩，所以进了莱佛士书院。他一直就是他妈妈的骄傲。可是在两年前，突然听朋友说这个孩子跳楼自杀了。 [...] 然后就听别人说是因为妈妈可能是有那种焦虑症，就天天念叨孩子，造成孩子的压力很大。 [...] 你看这个孩子被养到大概有十八九岁，就这样跳楼没了。我听到就很难受，一个这么优秀的孩子，我觉得父母的教育问题导致了这个孩子变成这样对吧？"

这一事件促使 Julia 反思自己的育儿方式和期望。汲取她朋友的教训，现在她不断提醒自己降低对儿子学业成就的要求，认为物质成功不应以牺牲孩子的福祉为代价：

"听闻此事后，我深刻反省 [...] 对。你不是一味考虑孩子一定要进剑桥，一定要去美国哈佛，他才会有出息。当然他能这样子的话，我们中国人说，那也是我们的福气。可是如果他有问题，我们真的是要帮他解决。他能飞多高就飞多高。他没有能力去飞也没有关系，只要他健健康康对吧？"

总体而言，多数参与者表现出共同的倾向：拒绝以物质成就为核心的狭隘成功定义。他们更关注子女幸福，将有意义的生活定义为孩子自主选择的生活方式。这些父母的关切呼应了受西方影响的现代育儿话语——强调儿童享有“幸福无忧童年”的权利，推崇自由、以儿童为中心和幸福导向的育儿模式（Bina-Pollak 2014, p.31）。当代育儿理论常批评中国虎式育儿，认为中国父母“像对待财产般爱孩子，限制其自由，忽视子女的基本权利”（Chen and Zhang 2003:248，转引自 Kuan 2015）。正如 Beck 等人（2024）所指出的，中国父母（尤其是高学历中产阶级）在资源方面的提升，使他们更容易接受西方价值观，并转向后物质主义的追求。这些父母（如我们的研究对象）如今更加关注拓展“何为良好育儿”以及“如何更好地支持子女追求美好生活”的定义（Kuan, 2015）。

然而有趣的是，参与者一般将自己视为常规中的例外。据他们描述，“虎式育儿”理念和对“龙子”的期望在新加坡中国新移民群体中仍属普遍现象：

“新移民圈子里，每个人的虎式育儿都很极端[...]但是中国家庭就不一样，新移民家庭大家都是奔着哈佛去的，都是奔着哈佛剑桥去的一个个的。”（Holly，两孩母亲）

下文我们将探讨这些移民父母在新加坡的实际育儿实践中如何与现实进行协调，意图指出父母实际的育儿理念和实践行为与他们所声称的意识形态相左的情况。

### 新加坡育儿现实的调适：被“迫”成为虎爸虎妈

尽管中国移民父母怀着良好意愿希望接纳对于成功更广泛的定义，并批判那些对学业要求过于苛刻的育儿方式，我们发现他们宣称的信念与实际施加的期望和采用的实践行为之间存在不一致。这种不一致的一个突出表现是：虽然许多父母声称重视孩子的自主权，但他们往往想当然地认为孩子未来必将接受高等教育。无论子女的个人志向如何，大学学位都被视为不可妥协的最低成就标准。这一点在 Sarah 的叙述中得到了明确体现。理论上，她尊重孩子的选择，并

相信成功不应一纸文凭来衡量。然而她随后承认，如果孩子偏离传统教育轨迹（即高中毕业并获得大学学位），她是无法接受的：

"没有具体的规划，只是说至少你要去考到一个还不错的中学，不一定是第一名，第二名，前四名的，可是你至少要考一个还不错的中学然后至少要去读一个大学。如果考不上大学的话我还是有点不能接受，我觉得将来要读一个大学。"

Sarah 所说的"大学"特指新加坡各所公立大学，如新加坡国立大学和南洋理工大学，这两所大学在全球排名中长期名列前茅。Sarah 认为自己的期望完全合理，甚至自认为要求较低，因为她并未施压要求孩子进入"英国或美国那些名校"。

Sarah 对大学教育的执着追求、对名校的显著偏好，以及对高等教育文凭价值的高度认同，都印证了 Brown (1990) 提出的"家长主导制" (parentocracy) 概念——即父母对子女教育选择和发展路径的过度干预和影响 (Barret DeWiele et al., 2015)。虽然"家长主导制"常与教育市场化效应相关联，但其在中国语境下的表现还需结合根深蒂固的儒家文化来理解。这种文化形塑了父母对亲子关系的理解，也界定了他们为确保子女未来成功所认定的必要干预与控制程度。

大多数参与者在强调儒家家庭等级观念的社会文化环境中成长。儒家思想主张父母（特别在教育领域）对子女拥有管教权，而子女则应服从管教以获得成长益处 (Huang & Gove, 2015)。尽管本研究中的父母试图尊重子女的自主决策权，但根植于中国儒家教育的文化特征往往持续产生影响。他们发现自己在不自觉中表现出与其试图抵制的意识形态相一致的育儿行为。正如 Julia 不无遗憾地承认：

"然后中国的家长就会不停地指导他，哎呀你这个是应该这么做，哎呀你应该要去那个  
那样做会更好，以为自己在教孩子其实是在不停地左右孩子自己的自主思维  
[...]因为现在他们大了其实小的时候我可以适当的放手就是没有必要去参与那么多但是  
当时那个时候因为我还是很重视孩子的教育和这个整个家庭的这个整体的利益这一方  
面就是中国人传统思想吧，所以孩子的事情我是参与了很多的。在该给予的时候给  
予，在该放手的时候放手，我觉得这个算是好的家长吧，但是真的很难，很难做到。"

一些父母还将自己未能坚持“不过度追求成就”这一育儿信念的原因，归咎于在同胞社区中所面  
临的巨大压力，迫使他们不得不顺应主流的育儿范式。我们观察到，尽管参与者并不居住在中  
国新移民聚居区，其子女也就读于新加坡人为主的学校，但他们似乎与当地育儿社群基本脱  
节。相反，他们在育儿方面主要依赖来自同胞社群的资讯来源，并持续观察和比较自己与其他  
中国移民在育儿理念和实践上的异同。正如前文所述，受访父母普遍认为，新加坡移民社群中  
主流的育儿理念和实践往往与其个人教育理念存在矛盾。这一群体明显倾向于采纳“虎爸虎妈”  
式的教育方式，尤其注重子女取得优异的学业成绩。具体表现为：多数父母不仅为子女安排私  
人补习课程，还通过高强度辅导帮助其备考精英教育项目，如高才教育计划<sup>3</sup>（Gifted  
Education Programme，简称 GEP）。尽管受访父母对同胞采用的“虎爸虎妈”教育理念持批判  
态度，但这种批判态度往往与他们自身存在的育儿信念矛盾及教育效能感的不安相互交织。

例如 Holly 希望对儿子的教育更宽松，因此未让他参加补习班或施压备考 GEP 选拔测试。然  
而当儿子落选 GEP 时，Holly 责备自己未像同胞那样施压，担心自己扼杀了他的成功潜力。她  
反思道：

---

<sup>3</sup> 高才教育计划(GEP)旨在满足智力天赋学生的学术需求，这些学生通过小学三年级的测试被选拔出来，并提供比主流课程更具挑战性的课程(教育部 2022)。2024 年，新加坡政府宣布对高才教育计划进行改革；本研究中收集的数据早于此次改革。

"其实应该从一开始报班的，对，没有。我觉得能上就上不上就不上了，后面就还是有一些后悔的，就是感觉哎呀上天给了你一个好苗子，你没把他养好，说不定养好了是不是哈佛的人，没养好就是一个普通的人（笑），也许人家就是一个登上月球的人（笑）。

### 儒家家庭文化与"面子"

我们认为，这种遵从虎爸虎妈规范的压力深受两种中国传统观念的影响。首先，父母与子女被视为一个集体单位，子女的成功或失败直接反映了父母的能力（Lam 1997）。其次，“面子”的重要性。这里，面子指的是“通过生活中的进步、成功和炫耀而获得的声誉”（Hu 1944, p.45）。拥有面子是一件被高度重视的事情，可以为一个人带来一种“优越的社会自我价值感”（Ting-toomey 和 Kurogi 1998, p.187）；而丧失面子则会产生负面影响，这将导致个体难以“在社群中维持正常的生活”（Hu, 1944, p.45）。鉴于互依性与集体利益构成中国社会生活的基础，面子被视为中国家庭的共同资产，由父母与子女共同持有。因此，即便不完全认同主流社会标准，父母仍必须按照社会认可的标准培养成功的子女，通过子女的成就来赢得而非失去面子。

Holly 尴尬地承认，尽管不想与社区中的虎爸虎妈为伍，但有时仍会倾向其高期望、高压的育儿方式——强迫儿子尽可能努力学习，牺牲非学术相关的兴趣，以求进入名校超越同龄人。她指出，儿子进入名校能“让她脸上有光”，可向社群中的其他移民同胞炫耀。她补充说道，若发现别的孩子领先于自己儿子，会“立即感到情绪低落”。同样，研究中唯一的父亲 Sam 感叹，尽管一直拒绝虎虎式教育理念，他也变成了“不情愿的”虎爸。他声称“被迫成为虎爸是因为周围人人都是这样做的”，而不想被视为逊于其他父母。据 Sam 所述，除非学术性的兴趣爱好班以外，他目前还为儿子额外报名参加了四种不同的补习班，以确保他在同龄群体中保持顶尖尖学生的地位。

## 中产阶级的焦虑与移民不安全感

除儒家传统影响外，这种倾向还可从父母的社会阶层和东道国背景等维度进行解读——需要强调的是，育儿理念和期望的形成具有多维度的成因。以两位孩子的母亲 Sofie 为例，她特别强调了自身中产阶级身份及其惯习对她的深刻影响。Sofie 最初表露出对中国父母普遍对孩子抱有高期望这一现象的矛盾心理：“鸡娃不如鸡自己”。

尽管如此，Sofie 坦言自己确实会对子女的学业表现施加压力。她认为，这种压力对于确保子女未来获得高薪工作、“至少维持我们[家庭]现有的中产阶层地位”是必要的。Sofie 的这一立场恰与 Cindi Katz(2008, p.5) 提出的“子女作为积累策略”概念相呼应——中产阶层父母对子女教育成功的期望，实际上与他们自身对未来社会经济地位及代际向下流动的深层恐惧密切相关。Ehrenreich(1989)指出，这种阶级再生产焦虑源于认知：不同于可通过财富传承确保子女地位的上层阶级，中产阶级的地位是靠个人“脑力劳动”赢得的，难以直接传递给下一代 (Lentz 2015, p.23)。因此，像 Sofie 这样的中产阶级父母会焦虑地为子女设定高标准的学业要求，引导他们进入专业职业领域，以确保家庭的社会地位得以维持。

对于像 Sofie 这样的移民父母而言，他们的中产阶级焦虑因其移民身份而变得更加复杂和强烈，特别是对“被迫回流”的恐惧。Sofie 将自己与那些嫁给澳大利亚人或德国人的朋友作比较，指出这些朋友有条件且有能力对子女的学业保持相对宽松的期望。如她说：“即使他们的孩子成绩不佳，最坏的情况也不过是回到德国、澳大利亚或美国——这并不算糟糕。”然而，Sofie 感到自己的子女并没有这样的安全保障。回到她福建的家乡——那个她“历尽艰辛”才得以离开的地方——意味着他们将面临比新加坡更差的生活条件。因此，确保子女取得优异学业成绩并在新加坡获得理想工作，不仅关乎维持中产阶级地位，更是防止他们回到她曾经竭力逃离的生活环境的关键策略。

## 揭示新加坡教育的现实

研究还发现，部分参与者对子女教育成功的焦虑源自一个关键认知转变：他们意识到新加坡的教育环境与移民前的想象截然不同——这里并未提供预期中那种轻松快乐、非应试导向的学习氛围。实际上，新加坡教育体系本质上奉行精英主义原则，与中国体制相似，都根据学业成绩将学生分流至不同的教育和发展轨道（Ho, 2012）。正如 Molly 所描述的：

"就是你开始的时候全部都快乐教育，然后等到人家开始分拨的时候，你就发现，唉，这个可能精英真的是出来了，然后那些，嗯，一般的孩子真是就掉下来了，就是这样。 [...] 就它的主旨，它所有都基调都定下来它是精英的，所以这种残酷的、这种刷人这种系统，它也没办法，对它来说是正确。"

在新加坡教育体系中，中学生依据小学离校考试（PSLE）成绩被分流至三种不同的课程轨道：快捷课程、普通（学术）课程和普通（技术）课程。这一分流机制直接决定了学生在中学阶段所能获得的教育资源及后续发展路径的显著差异。以快捷课程为例，入选该课程的学生被教育系统认定为具备学术潜力，因而获得参加 O 水准和 A 水准考试（大学入学的关键门槛）的资格（MOE, 2019）。尽管新加坡教育部近年已对分流制度进行改革，试图降低以学业表现为单一标准的分层效应，但基于成绩的差异化安排仍然存在（MOE, 2023）。作为决定孩子未来教育轨迹（进而职业机会）的最重要因素之一，PSLE 在公众心中仍具分量(Göransson, 2015)。

鉴于新加坡教育结构，Molly 现在坚信在新加坡就读的孩子必须学业出色，否则将难入大学。更重要的是，她强调学业平庸的孩子会被新加坡社会"淘汰"，最终"过上平庸的生活"。因此如 Zhou 和 Wang(2019)强调的，不应仅将中国父母倾向高期望和专制育儿实践归因于儒家文化。虽然文化价值观有着持久的影响力，但"文化与结构相互作用"——父母有时必须调整育儿理念、期望和实践，以响应当下的社会条件，让孩子能在其中茁壮成长(同上,p.17)。

## 结论

本文探讨了中国移民父母在新加坡对子女教育和未来发展的信念、期望及实践。我们的分析揭示了这些父母对中国竞争激烈的教育环境的不满，批评其对卓越的苛刻追求及给家庭带来的巨大压力。对这些父母而言，新加坡最初代表一条"逃离路线"(Waters 2015, p.283)，提供更轻松、少注重成就的环境。他们普遍持有这样的理念：良好教育和生活不应局限于学业成就、职业成功或向上的社会流动；相反他们提倡更广泛的成功定义，强调子女幸福的重要性。与中国父母努力培养"龙子/女"(Wu 和 Singh 2004)的典型形象不同，本研究中的父母表达了相对温和的期望，希望尊重子女自主权。其育儿信念类似主流育儿意识形态——这些意识形态多批判虎爸虎妈式育儿，推崇自由、以儿童为中心和幸福导向的育儿模式。但与 Beck 和 Nyíri(2022)的研究相呼应的是，我们也观察到中产阶级中国移民父母宣称的育儿信念与实际期望和实践间存在类似的不一致和矛盾性。所以，尽管渴望减少对学业成就的强调并尊重子女自主权，一些父母承认参与了其试图抵制的行为，如管控和对子女施加超高的学业期望。

为解释中国移民育儿话语中的这些明显不一致，我们首先认为：这些父母在协调理念与实践时的挣扎，源于其成长中儒家价值观（如父母权威和维护"面子"）的持久影响，这些继续塑造着他们的育儿模式倾向。这常导致他们回归专制型的育儿实践、施加严格期望，并感到被迫遵从新加坡同胞社区普遍的虎爸虎妈做法。同时我们强调：这些不一致性被中产阶级父母对代际向下流动的焦虑所加剧，这些焦虑又因移民身份相关的不安全感（无论真实或感知）而加重。加上新加坡作为同样竞争激烈社会的现实，这些担忧迫使父母重新强调以学业和职业为中心的狭隘成功定义。尽管在话语上表达抗拒，他们担心偏离这些规范可能危及子女——最终是其家庭——的未来。

值得指出的是，作为一个广泛的类别，"中国移民"包含了多样的社会经济地位、教育背景和习俗，等等。因此我们承认本研究在捕捉中国移民父母育儿信念和实践全貌方面的局限——参与

者多为受过良好教育、高收入的个体。未来研究若能纳入来自更广泛阶级背景的中国移民父母观点，或能产生更丰富的研究发现。

本研究主要依据父母自我陈述的育儿信念和实践，因此无法完全排除社会期许偏差的影响（Bornstein et al., 2015）。部分家长可能会刻意少谈那些可能不被社会认可的育儿观念（如专制型“虎妈虎爸”教育方式），而多说更受社会接纳的育儿理念（如以子女幸福为首要考虑），从而向研究者呈现“理想父母”的形象。尽管存在这些局限，我们的研究发现仍然为理解华人移民在非英语国家（特别是新加坡特殊的社会文化环境下）的育儿实践模式，提供了重要的实证贡献。